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基地

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中心

“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实证研究高级讲习班

田野调查报告选

主编 白振声

唐卫青 著

日月潭边邵人社会宗教文化的民族学考察

RIYUETAN BIAN SHAOREN
SHEHUI ZONGJIAO WENHUA DE
MINZUXUE KAOCHA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阅 览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基地

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中心

“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实证研究高级讲习班
田野调查报告选

主编 白振声

唐卫青◎著

林修澈 白振声◎指导教师



日月潭边邵人社会宗教文化的民族学考察

RIYUETAN BIAN SHAOREN
SHEHUI ZONGJIAO WENHUA
DE MINZUXUE KAOCHA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月潭边邵人社会宗教文化的民族学考察/唐卫青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5660 - 0007 - 1

I. ①日… II. ①唐… III. ①宗教文化—研究—南投县
IV. ①B928.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2440 号

日月潭边邵人社会宗教文化的民族学考察

作 者 唐卫青

责任编辑 吴 云

封面设计 汤建军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3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0007 - 1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实证研究高级讲习班 民族学田野调查报告选

编 者 的 话

为拓展和深化“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继承和弘扬民族学应用研究、实证研究的学术传统，加大培养优秀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人才的力度，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民族发展与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以本校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人类学、民族社会学三个专业的在读博士研究生为对象，于 2009 年 4 - 6 月间开办了首届“民族发展与民族问题”实证研究高级讲习班。讲习班聘请了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全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在本学科应用研究领域有着丰富田野调查经验和取得重要学术成果的 9 位专家（他们来自 6 所高校和科研单位）担任学术指导，并围绕各自的田野经历与学术专长进行授课。参加讲习班的成员根据自己的听课感受、研究兴趣与特长，并结合学术指导专家的研究方向，向他们申报课题。每位专家根据对选题申报书的审议，从中遴选 1 - 2 名博士生进行指导。2009 年 7 月，由本研究中心资助入选的 19 名博士生根据各自的课题，先后奔赴沿海、边疆、城市、农村、牧区、林区乃至台湾省的少数民族地区，从事为期三个月左右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一系列的田野调查报告。

严格地说，仅靠短短 3 个月左右的田野调查，想要完成一篇深刻而有学术见地的民族学田野报告是困难的，它也与民族学一

贯倡导的长期观察、居住体验的规范性田野调查要求存在差距。然而，通览上述 19 篇成果，其中 90% 以上都是作者先前已经从事或正在进行的研究内容，而且在调查点都有过不止一次或长或短的田野调查经历，有的还就相关内容发表过文章，有相当的前期田野工作经验与成果积累。而本期田野调查高级研讨班的举办，则为他们已有研究的深入、深化提供了难得的平台、条件。

有鉴如此，我们通过指导专家的推荐和研究中心评审组的评审，从中筛选出部分学术研究价值和现实应用价值相对突出的调查报告集结出版。

毋庸置疑，以严格的学术水准要求，这些作品还多显稚嫩。不过，从选题内容到调研的视角，仍能看到其中包含着的强烈时代气息、学术使命感和探索精神。拔苗助长绝不可取，但搭建学术平台，培养学科新秀，鼓励调研实践，激励成果创新，则是我们的目标和责任。现尝试性地推出这批调研成果，以期接受同行和社会的检验与指正。

白振声

2010 年 11 月 6 日

目 录

序 言	(1)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1)
二、相关研究动态	(5)
三、研究方法	(10)
第一章 概 况	(11)
第一节 日月村及邵人	(11)
第二节 邵人的神话传说	(17)
第二章 狩猎祭	(24)
第一节 狩猎祭前的准备	(24)
第二节 狩猎祭	(46)
第三章 拜鳗祭	(77)
第四章 中元普渡	(97)
第一节 祭拜的准备	(97)
第二节 中元节普渡	(107)
第五章 教 会	(149)
第一节 教会概况	(149)
第二节 教会活动	(151)
第三节 第二次教会活动	(154)
第六章 过 年	(156)
第一节 过年前的活动	(156)
第二节 杵音活动	(159)

2 日月潭边邵人社会宗教文化的民族学考察

第三节 祭拜与除秽	(167)
第七节 德化国小与唱歌	(189)
第八节 连续三个晚上的歌唱	(195)
第九节 半程祭	(198)
第十节 最后的祭祀	(208)
第七章 日常的宗教行为	(210)
参考文献	(221)
附 录 邵人农历八月祭词的汉语摘录	(224)
后 记	(228)

序 言

中国台湾的民族格局一直处于动态的过程中。1954年，台湾当局经过民族识别，除汉族外，确认的少数民族族群分为平埔人和高山诸族两大部分。确认平埔人包括凯达格兰、噶玛兰、雷朗、道卡斯、巴则海、巴布拉、巴布萨、邵、洪安雅、西拉雅10个族群，统称“平埔十族”；高山诸部落则包括阿美人、排湾人、泰雅人、布农人、鲁凯人、赛夏人、邹人（音曹人）、卑南人、雅美人（又称达悟人）9个族群，简称“高山九族”。上述“高山九族”和“平埔十族”构成台湾19世纪50—80年代的少数民族族群格局。^①

本书的研究是在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中心的资助下得以进行的。笔者于2009年8—9月在中国台湾做了为期近两个月的田野调查。调查的主要地点是台湾南投县埔里镇的日月村，即德化村；以日月村的主要原住民邵人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宗教文化及相关仪式。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一）本书的研究有利于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和我国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与和谐发展

“中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多元民族文化是中国人的认同源

^① 杨圣敏：《中国民族志》，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39页。

泉和立国之本。在举世关注文化多样性和迈向开放社会的今天,多元文化还是中国积累道德资源,凝聚软实力,推动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实现和平发展的社会资本。”^① 对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了解与相互关系的探讨,对于中国的民族研究是必要的,这是促进民族关系和谐、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基础。陈奇禄曾经说道:“就中国历史言,台湾所居之地位,恰在中国文化区之东南,海洋文化区之西北,为两区文化交流之一重要场地。”^② 为此,对于台湾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有利于促进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有利于民族关系的发展与民族和谐建设。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虽然因海峡相隔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出现过一些曲折与坎坷,但是在文化的根源上台湾与大陆永远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随着 21 世纪的到来,两岸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其交流与合作的领域也越加宽泛。两岸的学术交流成为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本书尝试以一个中国民族学研究者的眼光真实地展现台湾地区的民族文化与特色,真实地描述台湾地区的特色文化事项,为相关学者与机构提供真实的资料。马戎曾经提出,应使民族问题“文化化”^③,本书力图从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文化,为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提供真实、客观的资料。书中的调查资料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时对促进民族间的了解、民族认同与和谐发展有着较为现实的意义。

① 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2页。

② 陈奇禄等:《日月潭邵族民族志调查报告》序,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6年。

③ 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民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载《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二）本书为中国民族志增添了新的内容

我国民族志的研究资料汗牛充栋，不仅历史悠久，而且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不过，在资料的收集中发现，由于许多历史或客观原因，对于“本是同根生”的海峡对岸的台湾少数民族的各个不同族群的研究资料还不够全面。为此，本书的研究首先就是从民族志的角度，对海峡对岸人口较少的族群邵人进行了实地民族志资料收集与整理。书中资料为我国民族志的资料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随着海峡两岸的交流与合作，台湾少数民族志的资料收集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在中国浩瀚的民族志资料中，没有台湾少数民族的内容是不完整的。本书可以视为大陆学者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三）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邵人文化更深层次的研究

邵人文化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对邵人文化的概述，粗线条地研究邵人文化的各个方面——历史源流、经济、政治、宗教、生产与生活方式等。对于邵人的研究，从1955年陈奇禄的调查报告开始，到2001年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系的调查报告，都是以宏观概述为主要方式。也许由于邵人人口太少，也许在历史的长河里邵人的环境（日月潭旅游景点内）被大家所熟悉，从而导致没有人刻意地为邵人文化作更深的探讨。台湾学者潘英曾为此感叹：“民国四十四年已列邵族为高山族十族之一，但目前通行的九族说并不包括邵族，而且也没有给邵族一个定位，造成邵族在民族学归属上一个尴尬的局面。”^①

^① 潘英编著：《台湾原住民族的历史源流》，台北：台原出版社，1998年，第118页。

本书试图从邵人文化的一个层面——宗教信仰上作专题探讨。这一视角可以说是说对以往概述式、宏观式邵人研究的突破。

另外，本书也突破了以往邵人文化研究者皆来自台湾当地学者的局限，大陆学者深入台湾邵人地区从事调研者中作者还是第一人。新的理论思维、新的观察视角对邵人乃至中国民族志研究的深入开展，将是一种引导和推动。

（四）本书的理想研究内容是邵人宗教文化

在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中心的资助下，作者于 2009 年 8—9 月在中国台湾做了为期近两个月的田野调查。

2009 年春季，在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实证研究高级讲习班上，作者有幸聆听到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张中复教授与林修澈教授的相关学术讲座。林修澈教授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对台湾少数民族研究多有建树。正是在林教授的指导与建议下，作者决定选择台湾少数民族中人口相对较少、文化涵化程度较高的邵人，作为学习和研究台湾族群的开端。“事实上，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者）台湾学者在高山族群分类的研究上，大多不过仍是拾日人牙慧而已，并没有重大突破。而且，族群分类的基点在于体质、语言与文化特质，要在这三方面做到面面俱到，并不容易。自日本占领时期从事高山族族群分类研究以来，便面临这一不易克服的难题。例如邵人，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是高山族系统。奇异的是，自日本占领时期起，便很少有人提起他们”^①。

^① 潘英编著：《台湾原住民族的历史源流》，台北：台原出版社，1998 年，第 94 页。

正是邵人如此有争议的境况，才更有研究的必要。邵人集聚在中国台湾日月潭边的日月村，邵人人口大约为 263 人。^① 由于时间、调查环境和个人精力等因素的限制，不可能选择较大族群进行调查与研究，而邵人人口较少且生存环境相对集中，是最为理想的研究对象。另外，邵人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这个族群的居住地被汉族人所包围，但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却又有着自身的特点，对其宗教的研究是最为理想的研究内容。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它始终都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它，无论对于学术还是对于现实，皆意义重大。

二、相关研究动态

中国台湾少数民族邵人宗教信仰为本书主要研究内容，现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相关研究综述。

（一）中国台湾地区邵人研究

邵人研究相对于台湾地区的其他原住民研究，可以说一直都处于弱势甚至是被忽视的地位，致使邵人的族称与族归属群分类比较杂乱。在日本占领时期，有的人认为属于布农人^②，有的人认为属于邹人。^③ 其族群的名称也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邵”，使用最为频繁的是“水沙莲化番”。对于邵人的民族志资料几乎是一个空白，仅有日本学者伊能嘉矩的日月潭调查日记。1897 年 9

① 有关邵人人数的数据各有说法，在本书的后文（第 47 页）中均有相关介绍，本处选择的数据是根据本次调查的实际状况而确定的。

② 伊能嘉矩、栗野传之丞：《台湾番人事情》，东京：草风冠，2000 年，第 31 页。

③ 森丑之助：《台湾番族图谱》，台北：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1918 年，第 3 页。

月伊能嘉矩到过石印社与头社，对邵人祖灵祭的祭祀仪式有所涉猎，称：“化番之俗，自农历八月初一（就是我们所说的八月二十八日）开始有新年的仪式，既是在三十天之间做戏。”^①内容相当简单，均为访谈记录，不是亲眼所见。其记录中缺少了邵人最为重要的文化特征符号：公妈篮、先生妈。

真正对邵人传统文化进行详细调查研究始于陈奇禄等人。1958年台湾国立政治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出版了陈奇禄等著的《日月潭邵族调查报告》。在其报告中写出了调查的缘由：“我们以为今日的邵族，正介在这两个文化（汉文化与原住民族的文化）的边缘，为文化接触变化过程的一个好例。我们并以为记录一个行将消逝的文化，为民族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是我们选择邵族作为调查研究对象的另一个目标。”^②这次调查始于1955年，国立政治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和南投县文献委员会合作进行，调查分为两期。第一期是1955年，时间约为一个月。第二期是1956年，时间约为一周。该书主要分日月潭边邵人社会、经济生活、宗教、体质及其语言五个专题进行介绍。其中日月潭边的邵人宗教由唐美君执笔，文中介绍了邵人的祖灵崇拜、巫师制度、重要仪式、禁忌梦兆及鸟占、外来信仰传入后的变化。由于调查时间为1月至3月，因此唐美君亲眼所见的仪式只是邵人农历三月的播种祭，以及修屋祭祀活动。本章中唐美君对其祖灵崇拜的观念有相当详细的记录，并认为“祖灵篮”^③是“邵族信仰中的一大特色”^④。

① 伊能嘉矩：《巡台日乘》，载森口雄念编《伊能嘉矩的台湾踏查日记》，板桥：台湾风物杂志社，1992年，第81页。

② 陈奇禄等：《日月潭邵族民族志调查报告》，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6年，第1页。

③ 祖灵篮，作者调查期间人们称其为“公妈篮”。

④ 陈奇禄等：《日月潭邵族民族志调查报告》，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6年，第100页。

唐美君在访谈中写道：报告者称“我们邵族每家都供有一支祖灵篮，里面所盛的是祖先从前留下来的衣饰。祖灵篮是我们作祭时的重要祷告对象。在告祖仪式以及我们为失魂者招魂时都向祖灵篮祷告；而这四位始祖都是听命于最高祖灵的。”^① 在唐美君的文章中，邵人巫师制度主要描写了传授的过程、职能、辖户等。文中对巫师的治病与招魂的仪式与记录，现在均已消失，其仪式记录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外来信仰在邵人的社会里已有影响，唐美君认为邵人都是双重信仰（祖灵与神一起供奉；祖灵与基督教一起共存）。^②

在陈奇禄等人的研究 40 年后邵人研究才再一次出现。1996 年山路胜彦的《台湾サオ族仪礼の世界の认同と求心性》，主要是以“认同的求心性”来解读邵人的仪式，密切关注祖灵篮与先生妈的作用。^③ 1998 年谢世忠和苏裕玲的《传统、出演与外资——日月潭德化社邵族丰年节庆的社会文化现象》，主要用观光人类学（即旅游人类学）的理论探讨了邵人与外来人的多种要素交织关系，注重的是邵人过年仪式^④中的内演（非观光性）与外演（观光性）现象。^⑤ 2003 年邓相扬的《邵族 ulalaluwan 正名之刍议》中，针对邵人的 ulalaluwan 中文名称的翻译提出了看法。目前大多数学者都将 ulalaluwan 翻译为“公妈篮”或“祖灵篮”，

① 陈奇禄等：《日月潭邵族民族志调查报告》，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6 年，第 100 页。

② 陈奇禄等：《日月潭邵族民族志调查报告》，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6 年，第 117—118 页。

③ 山路胜彦：《台湾サオ族仪礼の世界の认同と求心性》，载《关西学院大学社会学部纪要》，1996 年。

④ 过年仪式，即邵人农历八月的祖灵祭。

⑤ 谢世忠、苏裕玲：《传统、出演与外资——日月潭德化社邵族丰年节庆的社会文化现象》，载台北《考古人类学刊》，1998 年。

但他认为这种翻译不恰当,而“公妈”更是汉化的表现。^① 2001年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系师生利用暑假对邵人进行了为期7天的调查,出版了第二本《日月潭邵族民族志调查报告》^②,该书是对邵人的地理环境、宗教、经济、语言、政治社会现况、民族关系、教育与文化等进行的民族志调查综述。

2002年王玉婷在论文《拜公妈——邵族家庭的通婚与祭嗣的民族意义》中,认为构筑清晰民族边界的公妈篮是血缘关系淡化、语言流失的邵人的唯一具体事物。文中作者比较了公妈牌与公妈篮的区别,认为公妈篮不仅象征了家族的继承,而且也是整个族群的传承的重要因素,但对邵人在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如何还能保持自身的信仰及其动力何在作出解释。^③ 2003年周美淑在《人、家户与炉主(lotsu):邵族的人观研究》一文中认为邵人特殊的文化机制是炉主,炉主揭示了人与灵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个人在家户、社会中取得身份和转变身份等的密切关系。嫁给邵人的他族妇女并没有因为婚姻而自动取得家户的正式身份,也不会成为公妈篮中的一员。她的灵必须经过炉主制度才能够从娘家转到夫家,才能够在先生妈祭拜公妈篮的时候被告知祖灵。这种“身份在家户认同上的焦虑”就是公妈篮信仰维持的重要动力。^④ 2007年简史朗的论文《minthaw ya minshput(做番抑是做人?)——邵族祭祀体系的民族边界》认为邵人的祖灵信仰不仅依托公妈篮,还需要先生妈。如果先生妈不存在,就没有人

① 邓相扬:《邵族 ulalaluwan 正名之刍议》,载《族群意识与文化认同——平埔族群与台湾社会大型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3年。

②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系:《日月潭邵族民族志调查报告》,2001年。

③ 王玉婷:《拜公妈——邵族家庭的通婚与祭嗣的民族意义》(硕士学位论文),台北: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系,2002年。

④ 周美淑:《人、家户与炉主(lotsu):邵族的人观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北: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系,2003年。

能够完成祖灵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也就不可能执行祖灵信仰。该文拥有丰富的资料，这与简史朗能够使用邵语分不开。^① 2008年满天弥生在《先生妈、文本与仪式展演：当代邵族的生存策略》^②一文中认为，邵人的先生妈与相关仪式都是邵人的“生存策略”之一。

另外，关于邵人文化研究的书籍还有中国台湾邓相扬、许木柱著《邵族史篇》，该书主要对邵人的族群、历史、神话传说、文化传统、祖灵信仰与岁时祭仪等从历史发展的脉络进行了粗略介绍。^③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民族研究中心林修澈著《原住民的民族认定》，以邵人为个案提出了原住民民族认定的方法、标准等，重点介绍了邵人的民间宗教与邵人民间宗教的主要表现形式——公妈篮与先生妈，这种表现形式是认定邵人为单一民族的主要依据。^④ 2002年，田哲益（达西乌拉弯·毕马）出版了《台湾的原住民：邵族》一书，该书对邵人发展、社会制度与战争、经济活动与生活习俗、信仰与仪式、生命礼俗、文化与艺术等进行了简要介绍。^⑤

综上所述，学者对邵人的研究是全方位的。不过，经过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后，我们发现了学者与专家聚焦的邵人文化特征性符号：对先生妈与公妈篮的研究，是从文化边界、民族认同、集体意识等方面着眼，可以说是一种以邵人的具体代表物——先生妈、公妈篮作为象征符号进行研究。但没有把邵人宗教信仰作为

① 简史朗：《minthaw ya minshput（做番抑是做人？）——邵族祭祀体系的民族边界》（硕士学位论文），台北：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系，2007年。

② 满天弥生：《先生妈、文本与仪式展演：当代邵族的生存策略》，当代情境中的巫师与仪式展演研讨会，2008年。

③ 邓相扬、许木柱：《邵族史篇》，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2000年。

④ 林修澈：《原住民的民族认定》，台北：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2001年。

⑤ 田哲益（达西乌拉弯·毕马）：《台湾的原住民：邵族》，台北：台原出版社，2002年。

一个专题进行资料的全面收集与整理，而仅根据已有材料是无法还原该文化全貌的。

（三）大陆对中国台湾少数民族的研究

大陆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是对中国台湾少数民族的整体把握，如陈国强与田富达的《高山族》^①、许良国与曾思奇的《高山族风俗志——民俗文库之五》^②，以及罗春寒的《台湾平埔族群文化变迁之研究》^③。主要方法是历史文献研究法。这些研究让读者对台湾少数民族有了厚重的历史感，但同时却缺少了一些当代即时性。

三、研究方法

主要的研究方法：（1）田野调查法。通过田野调查，对所研究的对象采取观察、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式，以获得详尽的第一手材料，从而为撰写一份完整的调研报告奠定基础。（2）历史文献研究法。通过收集相关文献，为考察提供详细的历史背景资料，为历史的比较作参照。（3）跨文化研究法。本书是关于大陆学者对台湾邵人的宗教变迁研究。通过一位大陆学者对中国台湾邵人的异地考察，探讨其原始宗教信仰、涵化后的宗教、现代宗教的变迁过程和内容上的规律性。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整理被访谈者的内容时，尽量保留被访谈者的原话，而不作修饰与修改。

① 陈国强、田富达：《高山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年。

② 许良国、曾思奇：《高山族风俗志——民俗文库之五》，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

③ 罗春寒：《台湾平埔族群文化变迁之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